

第1章

天安門廣場：空間與政治

紅旗飄揚歌聲嘹亮，
人山人海慶解放，
人民大眾作主人，
古宮變成了新紅場。

這首海報上的新詩，在1949年2月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大會中出現。¹在當時仍稱北平，但不久後恢復舊名北京的祝捷大會上，中國共產黨宣佈解放軍已於1月31日解放了這座歷史名城。中共建國前後的日子裏，這種把天安門廣場比喻為莫斯科紅場的說法，相當流行。²這年的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舉世矚目。新政府重建首都北京的龐大規劃裏，天安門廣場立即成了工程的重心，但這規劃引發了漫長的爭議。

歐洲新成立的政權，為了宣告輝煌時代的開始，通常會到處建立有象徵意義的景觀或建築物，及改造政治空間如巨型廣場和高聳大樓。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新政府成立國民議會，豎立很多新的紀念碑，

1 Derk Bodde, *Peking Diary: A Year of Revolution*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Illustration 8.

2 《人民日報》，1949年10月3日，第2版。

並舉行大規模慶祝活動，來展示它脫離了傳統皇權。³法國歷史學家莫娜·奧祖夫認為，法國革命分子把時間與空間重整，以塑造一種開放與平等的新文化。⁴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Vladimir Lenin)在1918年4月頒佈了「紀念碑宣傳法令」，下令拆除沙皇的塑像，並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街頭豎立新英雄雕像，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馬拉(Marat)和傅立葉(Fourier)等受人敬仰的革命家、哲學家和進步人士。這做法顯示了蘇聯領導人相信建築是展示新政權力量的一種有效方法。⁵中共執政後，做法也一樣。除了引入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外，也致力建立新的政治空間，例如擴建天安門廣場。在重建北京城的總體計劃中，擴建廣場的工程是重中之重，另外還包括廣場周邊的兩座巨型建築：人民大會堂及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圖1)。⁶然而，擴建天安門廣場有甚麼目的？中共領導人真的想把天安門廣場改造成莫斯科紅場嗎？這樣的擴建是否受到蘇聯的影響？天安門廣場工程的真正性質是甚麼？要探討上述問題，必須把廣場工程放在更大的爭議層面去看，即建國初期新政府行政中心區的選址問題。

-
- 3 James A. Leith, *Space and Revolution: Projects for Monuments, Squares, and Public Buildings in France, 1789–1799*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3–56, 151–214.
 - 4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26–157.
 - 5 Christina Lodder, “Lenin’s Plan for Monumental Propaganda,” in *Art of the Soviets: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in a One-Party State, 1917–1992*, ed. Matthew Cullerne Bown and Brandon Taylo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6–32.
 - 6 洪長泰：〈空間與政治：擴建天安門廣場〉，陳永發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207–259；王軍：《城記》(北京：三聯書店，2003)。有關天安門廣場的紀念性質的研究，也可參考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Rudolf G. Wagner, “Reading the Chairman Mao Memorial Hall in Peking: The Tribulations of the Implied Pilgrim,” in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ed. 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378–423.



圖1 天安門廣場現貌。由北京《世界博覽》提供。

新行政中心區

中國共產黨1949年執政前後，即面臨迫於眉睫的問題：中央行政中心區應設在哪裏？可供選擇的是故宮的紫禁城，或在北平西郊建一座全新的行政中心區。1949年5月，中共成立了北平「都市計劃委員會」（簡稱「都委會」），由北平市長葉劍英（1897–1986）為主任委員，負責決定行政中心區的選址和制定整套計劃。都委會於5月22日在北海公園舉行成立大會，出席的有北平市副市長張友漁（1899–1992），北平市建設局長曹言行（1909–1984），清華大學著名教授、建築學家梁思成（1901–1972）與妻子林徽因（1904–1955），以及工程師華南圭（1875–1961）等人。會議決定「正式授權梁思成先生及清華建築系師生起草西郊新市區設計」。⁷這個決定後來引起了北京市委領導、建築師和蘇聯專家之間的激烈爭論：爭辯的一方是梁思成等人，他們想抓緊機會在北平西郊設立

7 〈都市計劃委員會成立大會記錄〉，北京市檔案館，150-1-1。

新中央行政區，但反對這建議的是極有聲望的建築師趙冬日（1914–2005）和朱兆雪（1900–1965），他們認為應重建北平老城區，反對另建新城市中心。

梁思成父親梁啟超（1873–1929）是中國清末民初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梁思成學貫中西，早年接受父親教導漢學經典，後來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習建築學，師承法國美術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畢業的著名建築師保羅·克雷（Paul P. Cret）。梁思成除了熟習西方新古典主義與近代建築學外，亦醉心於中國古建築。1928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回國後，兩人致力研究悠久的中國建築史，到偏遠的地方做了大量古建築調查，並力倡保護國家無價之寶的古建築與廟宇。⁸梁思成認為北京是世界最偉大的建築瑰寶之一。他看到這座中國古都，以「故宮為內城核心，也是全城佈局重心，全城就是圍繞這中心而部署的。但貫通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線。一根長達八公里，全世界最長，也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穿過了全城。」他盛讚北京城是「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⁹能夠為北京設計新的行政中心，簡直是夢想成真。

可是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到底該設立在哪個地方？梁思成提議在首都西郊另建新城，以保舊城。但他的專業並非城市規劃，故找來在英國念過城市規劃並與他看法相近的陳占祥（1916–2001）幫忙。1950年2月，兩人合寫了著名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俗稱「梁陳方案」（圖2）。他們認為建新行政中心區，需要大量的建築面積，在舊城內根本找不到足夠和合適的地方擴建，同時舊城的文物必須加以保護。在舊城區建新的行政中心，需要大規模拆除約13萬間房屋，不合理地驅逐無數居民。梁陳認為是「勞民傷財」之舉。因此，在北京西郊——公主墳以東、月壇以西——之間建造新的中央行政中心區，是極

8 林洙：《大匠的困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又見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9 梁思成：〈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梁思成文集》，4卷本（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1986），第4卷，頁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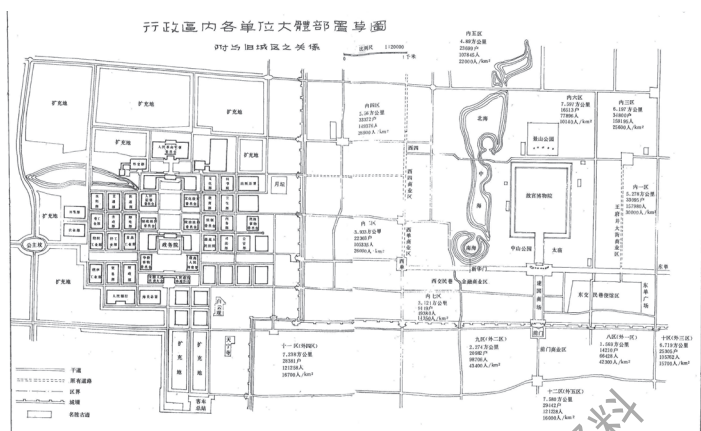


圖2 梁思成、陳占祥：〈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右方是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舊城區；左方是提議在北京西郊建造的新政府的行政中心。梁思成：《梁思成文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6），第4卷，頁2-3。

有道理及很理想的建議。¹⁰ 梁陳方案無疑是受到了1938年日本在北京西郊開闢新市區的計劃所影響。日本人想確立對北京的軍事佔領，並安置日本移民。¹¹ 不過，兩個方案竟然動機不同。日本人是想強化其殖民統治，而梁陳二人則希望保護古都文物。

梁陳方案很快就受到各方批評。第一批的抨擊來自專業界。1950年4月，任職北京市建設局、留學比利時的工程師朱兆雪和留學日本的建築師趙冬日，提出了〈對首都建設計劃的意見〉的反對方案（俗稱「朱趙方案」）。他們認為北京舊城「具有無比雄壯美麗的規模與近代文明設施，具備了適合人民民主共和國首都條件的基礎，自應用以建設首都的

10 梁思成、陳占祥：〈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梁思成文集》，第4卷，頁1-31。本書作者於1994年12月16日在北京訪問陳占祥的記錄。

11 越沢明(Koshizawa Akira)著，黃世孟譯：〈北京的都市計劃：1937-1945〉，《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3輯，第1期（1987年9月），頁235-245。

中心，這是合理而又經濟的打算。」朱趙的考慮以經濟因素為主，認為修建舊城比發展新區來得划算，而且重建舊城，可使舊的地方免於衰落，因而變得更加「繁榮」。¹²

朱趙方案與1949年蘇聯建築師提出的建設北京方案非常接近。而蘇聯專家的方案則是基於斯大林 (Joseph Stalin) 1935年〈莫斯科重建的總體規劃〉而制定的。1949年後，在毛澤東的「一邊倒」親俄政策下，¹³中國政府邀請大批蘇聯專家來華支援各項建設。從1950至1956年，來華的蘇聯專家估計有5,092名，包括城市規劃家、建築師、運輸專家、冶金學家和軍事顧問，並且隨後陸續增加。¹⁴最早到達的蘇聯代表團之一、由莫斯科副市長阿布拉莫夫 (P. V. Abramov) 帶領的城市規劃家和建築師，於1949年9月中、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前抵達北平。¹⁵經過幾輪考察後，團員之一的建築師巴蘭尼克夫 (M. G. Barannikov) 於12月向北京市委提交了〈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問題〉。斯大林1935年的規劃是把蘇聯首都發展成放射型佈局，以克里姆林宮和紅場為中心，放射出幾條主要的幹道，並以不斷向外散開的環城路來連接。巴蘭尼克夫預料到中國的首都也將以同樣的方式發展。他指出：

為了將來城市外貌不致損壞，最好先解決改建城市中的一條幹線或

-
- 12 〈朱兆雪、趙冬日對首都建設計劃的意見〉，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北京：缺出版社，1987），第1卷，《城市規劃》，頁203。
- 13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頁1477。
- 14 1949至1960年，蘇聯來華的顧問和專家超過了18,000人。參考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頁4及408。西方有關此方面的研究不多，見Deborah A.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in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ed. Odd Arne Westad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7–140.
- 15 〈關於贈蘇聯專家阿布拉莫夫等17位同志精裝毛澤東選集的有關文件〉，北京市檔案館，1-6-688。

一處廣場，譬如具有歷史性的市中心區天安門廣場，近來會於該處舉行閱兵式，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光榮典禮和人民的遊行，更增加了他【原文】的重要性，所以這個廣場成了首都的中心區，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斷定，這是任何計劃家沒有理由來變更也不會變更的。

巴蘭尼克夫還建議第一批主要行政大樓「建築在東長安街南邊」，這條街是天安門城樓前的幹道。¹⁶很明顯，巴蘭尼克夫認為北京只應有一個主要中心區，而梁陳方案則建議兩個中心區：一個在舊城，另一個在新行政區。阿布拉莫夫支持蘇聯同事的方案，認為「北京是好城，沒有棄掉的必要。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將新市區建設如北京市內現有的故宮、公園、河海等的建設。」¹⁷梁思成並不同意，雙方爭辯多時都無法消除分歧。¹⁸

梁思成的考慮重點既是文化又是政治，他說：「可以像美國的華盛頓，北京只是政治中心，不發展工業。」¹⁹不過，他保存老城珍貴歷史建築的願望與官方政策背道而馳。1949年政府已把首都從「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²⁰北京市長彭真（1902–1997）總結該年的官方政策時寫道：「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精神，目前黨的工作重心已由鄉村轉向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則是恢復與發展生產。」²¹這番話當然是反映

16 巴蘭尼克夫：〈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問題〉，《中共黨史資料》，第76期（2000年12月），頁8；同時見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C3-85-1。

17 〈市政專家組領導者波·阿布拉莫夫同志在討論會上的講詞〉，《中共黨史資料》，第76輯（2000年12月），頁19。

18 本書作者於2002年10月28日、2004年1月16日及2004年8月9日在北京訪問李準的記錄。李準是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總建築師。

19 陳幹：《京華待思錄》（北京：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缺出版年份），頁219。

20 規劃局：〈北京市總體規劃綱要（草稿），1958–1972〉，北京市檔案館，47-1-57。

21 彭真：《彭真文選：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78。

了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國家，應建基於強大的工業基礎的理論。斯大林的快速工業化模式，是由單一、高度集中的策劃所推動。中國政府1953年推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要全速發展工業。梁思成着重文化的主張，雖然得到了北京市副市長張友漁的理解，²²但很快被政府熱烈推行的城市工業化發展所掩蓋。另一位隨後來華的蘇聯顧問勃得列夫(S. A. Boldyrev)，對北京市委領導直言：「我們在蘇聯時，黨和政府一再告訴我們：要注意經濟問題……不能讓建築師隨便搞，應該給建築師的嘴上帶上嚼子(意即加以控制)。」²³

可是，對梁陳方案最激烈的批評並非來自蘇聯專家或梁的同行，而是中共中央。1953年，北京市委常委鄭天翔(1914–2013)公開批評梁思成的方案是一個「錯誤思想」。鄭天翔認為，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資源匱乏，建設新的政府行政中心會大量消耗本來就捉襟見肘的資源。²⁴然而，決定是基於政治而非經濟理由：中共高層純粹以政治因素拒絕了梁思成的方案。到目前為止，中共的中央檔案文件仍不讓公眾查閱，但從間接得來的資料看，毛澤東有參與最終的決定。阿布拉莫夫1949年在北京的一次演說中，透露彭真市長告訴了蘇聯專家，「關於這個問題曾同毛主席談過，毛主席也曾對他講過，政府機關在城內，政府次要的機關是設在新市區。」阿布拉莫夫補充說：「我們的意見認為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也是最經濟的。」²⁵1949年毛澤東和核心領導層已經進駐中南海，這昔日的故宮立即成為新政府的權力中心。對中共來說，中南海附近的天安門廣場，是個有豐富象徵意義的特殊地方。毛澤東一直認為在這裏發生的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個新階段」，並最終於1921年催生了中國共產黨。²⁶他在這裏宣告人民

22 〈都市計劃委員會成立大會記錄〉。

23 鄭天翔、佟錚：〈專家組的一些個別反映(一)〉，北京市檔案館，151-1-6。

24 鄭天翔：《行程紀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頁130–133。

25 〈市政專家組領導者波·阿布拉莫夫同志在討論會上的講詞〉，頁18；又見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C1-308-1。

26 毛澤東：〈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卷，頁545。

共和國成立，這個廣場因此既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源地，又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誕生地，在意識形態上是個繼往開來的關鍵聯繫。

擴建廣場的背景

天安門廣場的擴建是個十分複雜的政治決定，涉及四個互相牽連的問題：應否保留廣場東西兩側的紅牆與中華門等古建築？廣場四周將來的主要建築群的規模應怎樣？天安門廣場的理想面積應多大？最重要的是，該怎樣顯示廣場的精神面貌？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追查一下廣場錯綜複雜的發展歷程。

明(1368–1644)清(1644–1911)時代，北京分為外城、內城、皇城與紫禁城。天安門是皇城的正門，有一狹長T字型的宮廷廣場(圖3)。廣場依循古代《周禮》沿南北中軸線而建，有深厚的建築文化歷史。《周禮》規定，沿南北中軸線而設的建築，必須有嚴格的對稱佈局。昔日這個宮廷廣場四邊封閉，老百姓不能進入，1911年辛亥革命後，國民政府才開啟了天安門城樓前的長安街上兩座城門，即長安左門(俗稱「東三座門」)和長安右門(「西三座門」)。²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修建廣場的工程已經開始。1949年8月底，新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委會和公安局決定，修整東西三座門之間的地段，以騰出更大的空間舉辦10月1日的開國大典。工程要到9月底才完成，開拓了一個可容納16萬人的廣場。²⁸這次修葺工程規模不大，主要是粉刷牆身，立旗桿，設立為開國大典而建的臨時觀禮台，及清除多年遺留下來的垃圾。²⁹

27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北京城市規劃學會編：《長安街：過去、現在、未來》(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頁62。有關國民政府時期的北平歷史，見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28 《人民日報》，1949年8月31日，第4版。

29 《光明日報》，1950年9月1日，第4版；樹軍：《天安門廣場歷史檔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2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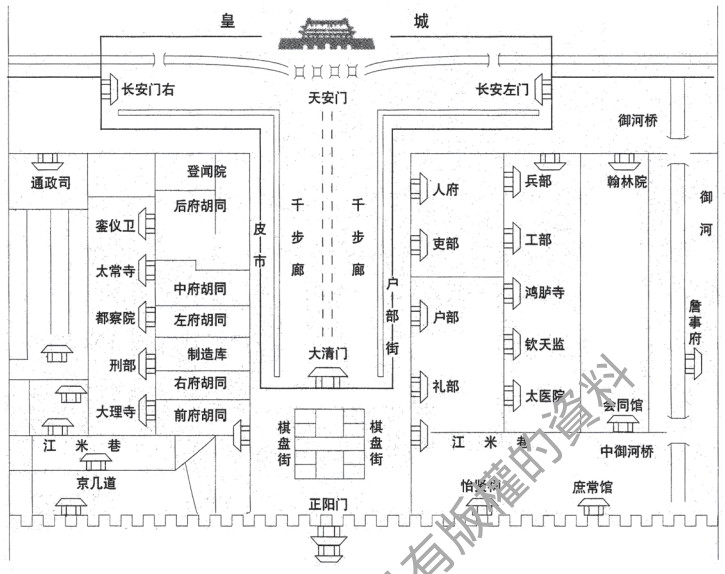


圖3 清代天安門廣場平面示意圖。《世界博覽》，第2期（2008），頁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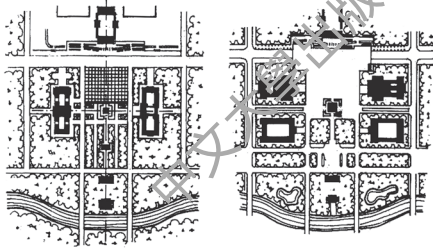


圖2-14 类型之一

圖2-15 类型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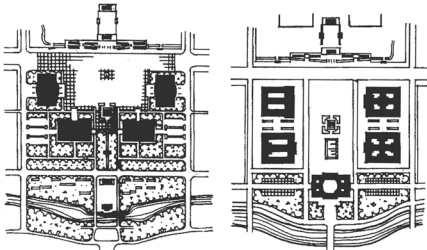


圖2-16 类型之三

圖2-17 类型之四

圖4 天安門廣場的四個重建方案。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北京：缺出版社，1986），頁45。

擴建天安門廣場是北京重建計劃的核心，其地位一直沒變。從1950至1954年，都委會和其他相關部門總共起草了15個重建方案(圖4)。³⁰這些方案都明確提出廣場的中心區準備興建政府的主要機構部門，但不會改變廣場傳統的T字形狀。為了擴展空地，市政府在1952年拆除了東西三座門，從而擴大了廣場面積。還把天安門城樓前臨時看台改建成鋼筋混凝土的觀禮台，由建築師張開濟(1912–2006)設計。³¹1955年，工人拆除了廣場東西側的紅牆，並在地面鋪上混凝土磚，又擴充了廣場南面，使面積達到12公頃。擴建還陸續推進。鄭天翔指出，其中一個方案是將廣場擴大到「二、三十公頃」。他補充說：「中央領導機關將要設在天安門廣場的附近，或者沿着市中心區的幾條主要街道修建。」³²

1958年8月，天安門廣場擴建有重要的發展。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召開。為了慶祝翌年建國十週年，與會代表決定在一年之內，於首都建造一大批重要建築，稱為「國慶工程」。這些工程有兩個主要的目標：拓展天安門廣場以及興建十座大型建築，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等，俗稱「十大建築」(見第2章)。到了1958年後期，提議中的國慶工程增加至17個項目。³³北戴河的決定被視為「歷史性決定」，因這是新首都第一次經歷大規模重建。³⁴為實現黨的決定，北京市委召集了全國各地一千多名建築師和藝術家，提出方案及編排工程的進度。1958年底，周恩來總理將最終方案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後獲得了批准。³⁵

30 董光器：〈天安門廣場的改建與擴建〉，《北京文史資料》，第49輯(1994年11月)，頁6。

31 本書作者於1996年9月16日在北京訪問張開濟的記錄。

32 鄭天翔：《行程紀略》，頁148。

33 國慶工程辦公室：〈關於慶祝國慶十週年建房施工安排的報告〉，北京市檔案館，125-1-1233。

34 參閱趙冬日著、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編：《建築設計大師趙冬日作品選》(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趙鵬飛撰寫的序言。

35 董光器：〈天安門廣場的改建與擴建〉，頁1–2；《建築學報》，第9–10期(1959年10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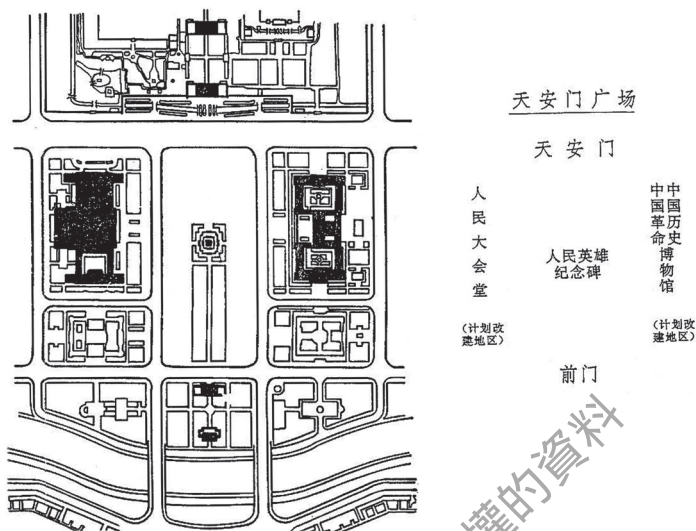


圖5 天安門廣場重建設計藍圖，1958-1959。《文物》，第9期（1977年9月），頁11；《文物》，第5期（1973年5月），頁10。

1958年天安門廣場的重建以空前的速度進行。年底便拆除了廣場南面（現址為毛主席紀念堂）的中華門（建於1420年）。在廣場上鋪設混凝土方磚，並把架空電線改埋地下。廣場北面的長安街從24米拓寬至120米。同時修建了一條專用的遊行大道，東起南池子，西至南長街，1,239米長，80米寬，可容120人並列遊行通過。改建後的廣場仍保留原有的南北中軸線。同樣重要的是，拓寬並延長了的東西長安街在天安門城樓前匯合，形成一條新的東西軸線。擴展後的廣場面積已達44公頃，東起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西至人民大會堂，相距500米；北起天安門城樓，南至正陽門，相距880米，可容納50萬人的集會，加上旁邊的東西長安街提供的空間，甚至可容納100萬人（圖5）。³⁶

天安門廣場多次的擴建工程，需要在規劃的施工地區拆遷萬多間房

36 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天安門廣場工程的基本情況〉，北京市檔案館，47-1-92。



圖6 1950年代中為擴建天安門廣場而拆除的周邊民房。中門是當時尚未拆除的中華門，遠處右上方是天安門。《世界博覽》，第2期（2008），頁20。

屋（圖6），這事官方史書甚少提及。1958年，為了要應付更急進的擴展方案，拆遷行動更加劇烈。此項任務交給了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馮基平（1911–1983）。拆遷工作自1958年9月19日開始，「經過三十天的苦戰，到10月10日基本完成了安置任務。」官方報告指出：「這次搬家的速度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在短時間內拆除了一萬六千多間房屋，包括原來的天安門廣場周邊的4,600間，及人民大會堂現址上的2,610間。官方報告指出，該工程是在黨的「群眾路線」方針指引下完成的。由於「事先準備倉促，協作單位未及很好組織，開始發生了些問題。住戶沒搬淨，工人就去拆房，供電部門撤電錶拆電線，供水部門拆水錶。」³⁷這樣大量拆遷民房之舉，是北京近代史上罕見的。但為了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圖，官員們認為上述問題就變得不大重要了。

蘇聯顧問的影響

天安門廣場擴建的另一個重點是蘇聯顧問的大量參與。中國現存的

37 〈擴建天安門廣場等處工程拆遷工作總結報告〉，北京市檔案館，47-1-61。